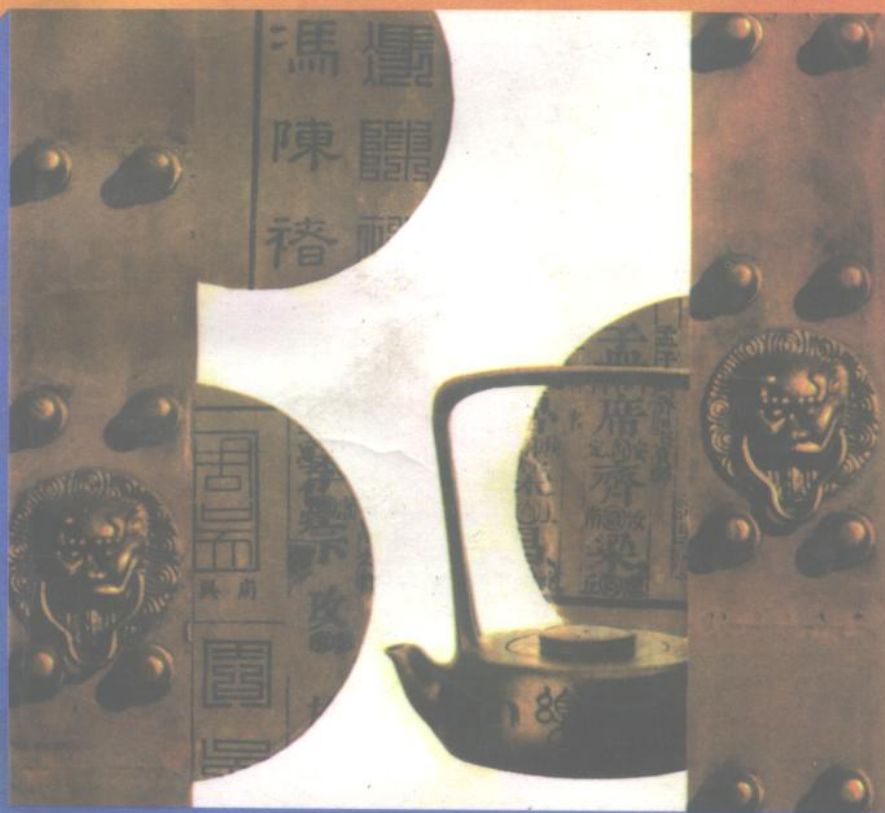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命名艺术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

尹黎云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葛小冲

封面设计:马家树

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

尹黎云 著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9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8000

ISBN7-81001-399-8/H·27

定价:9.80 元

序

王 宁

由于深感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知识已渐渐不为人们所知，两年前，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文史方面的老师，从提高社会文化素质的严肃目的出发，曾想编一套丛书，来传播那些与生活或阅读有关的、必要的文化知识。尹黎云同志的这本关于中国人名姓名称谓的书，就是当时设计并已完成的题目之一。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严肃的，不肯把一些其实是糟粕的东西掺进来，因此，出版的计划到处受阻，最终未能实现。现在，尹黎云同志所写的《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一书能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单独出版，他的工作总算产生了效果，是令人欣慰的。

中国人的姓、氏、名、字、号是一个涉及许多深入的社会历史内容的问题，阅读古代的文献典籍——不论是史学、文学还是哲学典籍，都会时时遇到，对现代社会生活也有广泛影响。这方面的知识属于那种看来事小、实则事大的课题，是很有必要普及的。难得尹黎云同志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把它说得那样深入浅出。尹黎云同志曾是已故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又是一位作家，我想，这两点正是使他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有利条件。

其实，中国人的姓、氏、名、字、号，时代色彩是很浓重的，不但古今差异很大，就是在古代的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实际称谓的习惯、规则以及命名的风格也各有特点，如果依历时的观念逐期来谈，大约可以形成一部阐述姓氏名字源流的历史。尹黎云同志的这本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主要着眼于历史源流而主要着

眼于基础知识,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可以比较轻松,也适合于非专业人员,更适合于对外汉语与文化教学。

总之,这是一部有益的书,我愿将它推荐给读者。

1993 年 5 月

目 录

序.....	1
一、开篇的话	1
二、姓氏的源流.....	10
1. 早期的姓氏	10
2. 姓氏的合一	20
3. 姓氏的概况	34
三、名、字考略	52
1. 名和范字	52
2. 小字和表字	68
3. 字和名的对应关系(甲)	81
4. 字和名的对应关系(乙)	94
四、说号	110
1. 号的由来及其发展.....	110
2. 自号及其特征(甲).....	122
3. 自号及其特征(乙).....	140
附:室号	158
4. 他号.....	171

五、假名种种	185
1. 化名和代号	186
2. 法名	199
3. 笔名	211
4. 艺名	229
六、关于命名	241
1. 命名的色彩	241
2. 命名的忌讳	259
3. 命名的艺术(甲)	268
4. 命名的艺术(乙)	285
七、结尾的话	304
跋	310

一、开篇的话

曾经有那么一部电视剧，专门描写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的童年生活。不知为什么，剧中的人物都以“平子”来称呼一个垂髫小儿。电视剧属于艺术的一个门类，对剧情进行艺术的虚构原是编导者的权利，无可厚非。但让张衡叫“平子”似乎并非虚构。《后汉书·张衡传》云：“张衡，字平子。”这显然是编导者的依据。只是编导者并不懂得“字”的含义。有人说，编导者曾查过《说文解字》，许慎云“字，乳也”，“字平子”不就是乳名平子吗？这或许是演义出的笑资，未必可信。不过，张衡在死了近两千年之后，莫名其妙地乳名“平子”毕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个笑话固然荒唐，总算还把字当做区别人的一种文字符号。更有甚者，则把人的字、号之类当做其他什么东西了。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履园丛话》点校本居然点出了这样一句话：

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其中“诚悬而直开”是什么意思呢？恐怕点校者也懵里懵懂，不知所云。所谓“柳”，其实是指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柳公权。柳公权字诚悬，故又称为柳诚悬。原来点校者让“柳诚悬”身首分家了。正确的标点应当如下：

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同样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戒庵老人漫笔》点校本，也点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偶阅邹先生《立斋智集》。

《立斋智集》这个书名好怪，倘若真的有人想“偶阅”一下，那就踏破铁鞋无觅处了。邹先生者，明人邹智也。邹智，字汝愚，号立斋，有一部作品行世，名曰《立斋遗文》。文中没有点出书名，

所谓“集”就是泛指邹智的作品，或许就是指《立斋遗文》。名号连称原是古人行文的习惯，“邹先生立斋智”就是由姓氏（邹）+尊称（先生）+号（立斋）+名（智）组成的称谓。正确的标点应当如下：

偶阅邹先生立斋智集。

这样就不至于哄骗读者去寻找那部根本不存在的《立斋智集》了。

有一部工具书，叫做《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粗制滥造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为中国历代美术家立传，这本来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既要立传，必然对立传的对象有些了解，这是极为普通的常识。然而，此书的编者对立传的对象似乎并没有弄清，以至于书中的错误屡见不鲜，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清代有个和尚，是个颇有影响的画家，自称“石头陀大汕”，人称“石濂和尚”，《辞典》里却把“石头陀大汕”和“石濂和尚”当成两个人。如果说编者缺乏历史修养，涉及到古人名字难免出些差错，那么涉及到现代人物，就不该出笑话了。事实恰恰相反，对现代人物他们也毫不留情地一分为二。例如当代中国画画家江上渔，字寒汀，居然也变成“江上渔”和“江寒汀”两个人。这样的工具书，说它误人子弟、害人匪浅，恐怕一点儿也不过分。

上述问题在近年出版的书刊和拍摄的影视剧里，可谓层出不穷。

也许有人认为，人的姓名只不过是一种符号，何必小题大作。人的姓名问题的确是“小题”。倘若以此类推，世上值得大作的文章委实不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大题。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大题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小题融汇而成的。抽掉这些小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成为一个空架子。虽说架子很大，倒是不值一提了。所谓“小题”和“大题”，也只是相对而言。假如有位教师讲文学史，把周树人和鲁迅当成两个人讲给学生听，这个学校的校

长绝不会把它视为“小题”。中国人的姓名问题，本来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讨论中国人的姓名问题，就是从—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中国人的姓名问题简单地划为“小题”而置之于不顾。同时，姓名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中国人的姓名，还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全面的透彻的了解。否则，要想弄清中国人姓名的各种问题，只怕也不那么容易。

世界各民族的姓名，由于受各自文化传统的影响，都各具特色。就以姓名的基本模式而言，欧美人一般不像中国人那样，把姓搁在名之前，而是采用先名后姓的顺序。如 Owen Robet（欧文·罗伯特），Owen 是名，Robet 是姓。即使基本模式相同的民族，也有不少差异。如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一般在名和姓之间另加一个名字，称做第二名字或中间名，这个名字可以是已婚女人的娘家姓，也可以是其他。书写时，常常只是用首字母表示。譬如 Kenneth L Pike（克乃斯·L·皮克），就是由名（克乃斯）、中间名（L）、姓（皮克）三部分组成。在欧洲，第二名字的使用就不太普遍，如果有，也是在洗礼时或在按手礼时得到的。欧洲多数国家重视第一个洗礼名，第二个洗礼名可以省略。俄罗斯人的姓名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名和姓之间还要夹进父名。如父亲姓 Иван（伊万），儿子的名和姓之间就要夹进 Иванович，意为“伊万之子”；女儿的名和姓之间则要夹进 Ивановна，意为“伊万之女”。这些习俗，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有时是难以理解的。有些中国人盲目效颦，本来叫“张红”，翻译成英文偏偏来个 Hong Zhang（红张）。这种做法实在没有必要。对外国人来说，“红张”并不比“张红”悦耳，而中国人听了，却像啃了一口生柿子。其原因就在于效颦者不明白，姓名同文化传统是无法分割的。

各个民族除了姓名的基本模式不同，取名的习俗也有很大的差异。据说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各个部族，给孩子命名的时间都颇有讲究。有的部族是在孩子出生时即刻命名，有的部族是在孩子出生后二十天才给孩子命名，有的部族是在孩子开始学走路时命名，还有的部族则习惯在孩子出生前先把名字确定好。西非加纳的芳蒂人给孩子命名很有趣，他们是以一星期的七天作为孩子的名字，如星期一出生的孩子就叫星期一。不过，男女有别：男人的“星期一”是库召，女人的“星期一”是朱芭。我国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景颇族、怒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流行父子连名的习俗，就是说，儿子名字的第一二个音节必须和父名的最后一二个音节相连，如此世代相传，绵延不绝。

在姓名的使用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与各自文化传统相称的习惯。据说北美印第安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对外，人人皆可称呼；一个对内，只有亲属可称呼。澳大利亚阿龙达部族的男人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公开的，供交际使用；一个是秘密的，供本族的长辈和最有望望的人掌握，而且只能对其本人使用。做妻子的只有和丈夫白头偕老之后，方可打听这个秘密的名字。这种两个名字的习俗和我国过去以字配名的习惯有几分相似之处。

如果我们对世界各民族的姓名问题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姓名的习俗完全相同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姓名比较相近，都是采用姓在名前的基本模式。但两者的差异还是大于相近之处。就说姓的数量吧，中国姓常用的仅五百个左右（主要就汉族而言），而日本姓近七万个，中国姓约为日本姓的0.7%，再加上人口的比例，日本姓中的大姓拿到中国来，恐怕也就微不足道了。中国人以单姓居多，因而中国人的姓名一般为三个字，而日本人以复姓居多，日本人的姓名必然多为四个字。日本人的姓名习惯上使用汉字，但读音上很有这个民族的特色。口

语汉字本来有两种读法：一是音读，即读音与汉语读音相似；一是训读，即按日语的本来读音发音，和汉语的读音风马牛不相及。就日语的表达来说，什么情况下用音读，什么情况下用训读，这是有规律的。但日本人姓名的汉字读音则不然，或音读，或训读，或音训混读，没有统一的规定。这样，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日本人看到一个陌生的姓名，也很难读得出来。因此，日本人在外交场合上，自报姓名是十分重要的。日本小学新生入学时，教师往往要先走访家长，弄清每个学生姓名的确切读音。中国人的姓名一般不存在这类问题。汉字虽然有一字多音的现象，但多数人取名还是尽量回避多音字，即使用了多音字，一般也是取其主要的读音。

由此可见，姓名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其实不然。归纳起来，姓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一是一人名。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小女儿、列文的妻子卡特丽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别有“吉提”和“卡嘉”两个名字。二是使用问题。一人多名，这些名字多半不是平行的，而是适应于各种场合的需要。这两点如果不弄清楚，读《安娜·卡列尼娜》，仅姓名问题就会使人感到云山雾罩的。

中国人的姓名也是如此。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姓名的习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姓名问题必然有其自身的特色。这些特色构成的姓名模式，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为例，《辞海》里是这样介绍的：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追谥文忠。

这就是说，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至少有“苏轼”、“子瞻”、“东坡居士”、“文忠”四个名字。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

则，读古书时，冷不丁地冒出一个“子瞻”来，说不定有人会理解成儿子往上看。这不是危言耸听。“诚悬而直开”不就“开”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其次，还要了解这四个名字是如何使用的，什么场合下用“苏轼”，什么场合下用“子瞻”，什么场合下用“东坡居士”，什么场合下用“文忠”。否则，还可能有人会让苏轼的母亲抱着婴儿时代的苏轼，直呼“子瞻”，甚而至于呼出“文忠”来。

中国人的姓名不仅复杂，而且在使用上也颇多讲究。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有篇文章叫做《柳子厚墓志铭》，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子厚，讳宗元”。这样的表达，不要说外国人，即令当代的中国人，如果缺乏一定的古代文化知识，也会感到不可思议。这位韩愈干吗说话要绕弯子？其实这并不是韩愈的过错。尽管他很善于写文章，在姓名问题上，他必须遵从习俗，绕这个弯子。中国的古典小说在姓名问题上，也处处反映出古代的习俗。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鲁肃是尽人皆知的艺术形象，他们俩在赤壁大战之前来往很频繁。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对话时，诸葛亮称自己总是言“亮”不言“孔明”，称鲁肃总是言“子敬”不言“肃”；反之，鲁肃称自己总是言“肃”不言“子敬”，称诸葛亮总是言“孔明”（或以“先生”代之）不言“亮”。我们不妨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中摘录几段：

孔明曰：“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

肃曰：“孔明，你也如何说此？”

肃曰：“肃与先生渡江以来，未尝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不仅诸葛亮和鲁肃如此，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遵循着同样的戒律，不肯越雷池一步。这不是说，鲁肃不能言“诸葛亮”，诸葛亮不能言“鲁肃”了。第四十三回鲁肃对孙权说：“肃至江夏，引诸葛亮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可问之，便知虚实。”第五十七回诸葛亮对

刘备说：“代瑜领兵者，必鲁肃也。”这两处地方都不是诸葛亮和鲁肃二人的对话，因而不必受上述戒律的约束。

不仅古典小说如此，古人的诗文涉及到人名也常常使人困惑不解。例如宋人刘过的《沁园春·寄稼轩承旨》有这样的一句：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

其中就涉及到三个人：一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其号为香山居士；二是宋代诗人林逋，其溢号为和靖；三是苏轼。题目中“稼轩”又涉及到一个人，那就是辛弃疾，其号为稼轩居士。

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中也有这样的一句：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粗略一看，很像单纯的写景，其实内中也涉及到三个人：一是唐人裴度，他退居洛阳后，筑别墅号为绿野堂，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觞咏其间；二是唐人李德裕，他在洛阳城外筑有平泉别墅，未出仕时，讲学其中；三是东晋人谢安，曾隐居在会稽的东山，以声色自娱。题目中的韩南涧则是指韩元吉，其号为南涧。可以看出，我国古人对人的称呼五花八门，其复杂程度比之《安娜·卡列尼娜》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无论中国人的姓名如何复杂，都不可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姓名的渊源及其发展规律加以考察，那么复杂的问题也可以变得眉目清晰。中国人的姓、名、字、号，诸如此类，无不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彩。研究中国人的姓名，其实质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正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不少外国学者甚至以毕生的精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什么理由置身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而又无动于衷呢？研究

传统文化，并不像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故步自封，是作茧自缚。不错，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确有个继承的问题。但就研究本身而言，首先是了解。这种了解不是浮光掠影的一知半解，而是透彻地掌握整个传统文化的内涵，这样才有可能对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也才有可能讨论到扬弃的问题。扬弃的过程说到底，不就是研究的过程吗？由此可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的姓名，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人的姓名问题，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又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中国人的姓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像切豆腐那样，一刀子一块地切开。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人的姓名问题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确切一点说，它们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有的人虽然在中国人姓名的问题上发生错误，其发生错误的原因未必与姓名知识有关。譬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在孙姓条目中推出一个叫“孙朗中，字朗三”的人来，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当然，说编者是向壁虚构也有些冤枉。他们依据的材料是安徽省宣城县的县志。光绪年间的《宣城县志》在《梅鼎祚传》中云：“孙朗中，字朗三。”这句话意思十分清楚，稍有点常识的人在《梅鼎祚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也会领会到，梅鼎祚有个孙子名朗中，字朗三，也就是说，这位“孙朗中”其实是梅朗中。《中国人名大辞典》“梅朗中”条下说得更明白：“鼎祚孙，字朗三。”不知何故，编者居然把“孙朗中，字朗三”活活剥下来，塞进他们的《辞典》里充当一个人物。这样的错误，跟姓名方面的知识毫无关系，严格地说，应当属于语文知识的范畴。有一部以《封神演义》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居然把南宫适(kuò)读成南宫 shì，这纯粹属于识字的问题。本书既然是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自然不可能涉猎这些题外话了。但

这并不等于说，这些题外话就不重要。强调这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系统地探讨中国人姓名的渊源之余，本书又以相当的篇幅研究了命名的艺术。命名的艺术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当前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讨论命名的艺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尝试。如果这种尝试对人们的命名有所启迪和帮助，我们将不胜欣慰。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研究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二、姓氏的源流

1. 早期的姓氏

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姓和氏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姓氏”条目下云：“表明家族的字。”这说明“姓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双音节词。要说区别，也有，那就是单说时，一般说“姓”。如“您贵姓”、“我姓王”等等。“氏”字有时也单用，但要放在某姓之后，表示姓什么的。如“王氏兄弟”，“王氏”就是姓王的。早期的姓氏可没这么简单，它们代表了两个概念。

先从五帝时期谈起。《史记·五帝本纪》是司马迁“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写成的。应当说，五帝时期的传说在这篇文章里汇总得比较全面。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开头提到黄帝“姓公孙”以外，一般只提“氏”不提“姓”。而且提到“氏”总是以××氏的模式出现。这些××氏加上《史记》三家注提到的××氏共有二十一个，我们摘引如下：

有熊氏	少典氏	有蟠氏
颛顼氏	高阳氏	神农氏
西陵氏	方雷氏	豢鱼氏
蜀山氏	陈锋氏	嫫毖氏
有邰氏	有娥氏	陶唐氏
散宜氏	高辛氏	少昊氏
金天氏	陆终氏	有虞氏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氏”无一例与名连称。如